

詞發其取舍之端。以警其俗。說者乃謂原
於此而始將問諸卜人。則亦

市一祖籍湖南。中學畢業後曾下鄉插隊。一
系八二年一月畢業。獲
校任教。一九八七
接中文系古代
研究生畢
文學碩士
位
禹山大學學院文系授古代
學科研究
王復先
方言。已
言。專話。專
典。生平著。另有合著
在《文學遺產》。《文史哲》。《文史

得復見

社長羅晴

中敵郭於

所從知

總編責任編輯

有紅梅

美術設計

金鞞

乃字

有所疑

因先生決之。

一無

乃字

君將何以教之。

一無將字。

一正也。

乃字

也。四字見曲禮。

龜底。

龜原曰。吾寧

也。



詩經與中國文化

中國詩經文庫

《詩經》與中國文化

作者 廖 群

出版 香港東方紅書社

責任編輯 紅 梅

美術設計 金 鞍

字 數 230 仟字

版 頁 850×1168 毫米 32

出版日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元一九九七年八月第一版

印 刷 深圳金湖印刷廠第一次印刷

印 張 15

印 數 1000 冊

定 價 27.5 圓

國際版號 962—8253—05—X

目

錄

引言

上篇

上古文化與《詩經》

第一章 牧野之戰：中國文化的轉折與起點

——孕育《詩三百》的文化土壤 [五]

第一節 尚在蠻荒中跋涉的殷商文化 [六]

第二節 西周：從神治走向人治 [一九]

第三節 從帝俊到天子舞：殷周文化交替的一個標本 [三二]

第四節 制禮作樂，「鬱鬱乎文哉」——《詩經》的母體和載體：周代禮樂文化 [四一]

第二章 「詩三百」·周文化的奇葩

——《詩經》文化現象論 [五三]

第一節 「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

——禮樂文化推出的一部音樂作品 [五三]

第二節 比興·原始文化疑結的符號與謳歌人性的基本主題

(一) 關於《詩經》文化人類學猜想的源起和歷程 [六三]

(二) 解謎：《詩經》比興中幾組「性」意象的史前文化探源 [七〇]

(三) 比興：牽着原始意象謳歌人性主題 [八三]

第三節 史詩與頌史詩·關於中國有史詩與《詩經》無史詩的思考

(一) 《詩經》史詩討論的尷尬 [八八]

(二) 史詩，一個必然的文化現象 [九一]

(三) 詩與歌：造型藝術與音樂 [九六]

(四) 頌史詩：關於《詩經》中「史詩」的一個新概念設想 [一〇〇]

第四節 關於《詩經》文化品性的輪廓描述

(一) 規矩儻事的少年人生：《詩經》的主要性格特征 [一〇五]

(二) 任性、自然·禮樂之「和」中的幾個不和諧音符 [一一〇]

第三章 從《詩三百》到《詩經》：文本闡釋中的三部曲

- 第一節 「賦詩言志」：「詩三百」從音樂走向語言的契機 [一一七]
第二節 孔子與《詩》教：《詩》學闡釋導向的確立 [一三〇]
第三節 「毛詩」：「詩三百」重塑后的「新版本」 [一四〇]
(一) 「潛龍勿用」：先秦時代「詩三百」在儒家手中傳遞的命運 [一四一]
(二) 時來運轉：秦漢更迭與「詩三百」登上「經」的寶座 [一四七]
(三) 「三家詩」與「毛詩」 [一五二]
(四) 「毛詩」：「詩三百」重塑后的「新版本」 [一五五]

下篇 《詩經》與中國文化

第四章 「二雅」作者的終極關懷與中國文人學士的政治懷抱和史命意識

- 第一節 「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獻詩與詩志傳統的形成 [一六七]
第二節 憂患·兼濟：中國古代士人的崇高情懷 [一六八]
(一) 立志高遠的兼濟之心 [一七八]
(二) 投身政治的施濟作為 [一八六]

- (三) 藝國捐軀的崇高精神 [一九〇]
第三節 「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中國古代士人的人生價值取向 [一九三]
第五章 《風》詩情歌的魅力及其命運 [二〇四]

第一節 《風》詩中的性愛與情愛

- (一) 性愛詩：言「性」是坦然的 [二〇五]

- (二) 情愛詩：姑娘由「放達」，被追求到任人擺布 [二一二]

- (三) 質樸率直與含蓄蘊藉：《風》詩情歌的兩種境界 [二一七]

- (四) 幾點認識：《風》詩情歌的文化特征 [二一二]

第二節 情系何處：中國古代文人情愛心理剖視

- (一) 愛情在這裡不是主題 [二二六]

- (二) 「載妓隨波任去留」：中國古代文人的情愛對象與「櫟詩」「雙詞」的審美特征 [二三〇]

- (三) 「欲」的釋解與無「話」可說 [二四五]

第三節 濃情·真情：與《風》詩情歌一脈相承的民歌系統

- (一) 同樣的情熱似火 [二四七]

- (二) 同樣的直白如話 [二五六]

第六章 「詩言志」與中國偏于主觀的藝術表現傳統

- [二六〇]

第一節 一個由「現實主義」涵義辨析引出的話題 [二六〇]

第二節 情真景虛與舍『事』重『發』：《詩經》偏于主觀心理的創作特征 [二六五]

(一) 因景抒情而清真委虛 [二六六]

(二) 「緣事而發」而舍『事』重『發』 [二七三]

(三) 「我」在所賦之內，并非「不加一辭」 [二七八]

第三節 意蘊生動的藝術之河 [二八二]

(一) 心靈之詩在漢魏六朝時期的發展脈絡及其強化 [二八一]

(二) 唐詩宋詞及其逸響：心靈之窗 [二八九]

(三) 畫向詩靠攏：「中國人之畫，意中之畫也」。 [二九四]

第四節 從『感物吟志』到『一切景語皆情語』

——一條圍繞着心物、情景立說的主觀詩學之路 [二九七]

第十七章 中和·《詩經》的審美理想與中國文化的基本品格

第一節 「溫其如玉」：一個獨特的人品喻體 [三〇九]

君子，理想的人格範型 [三一六]

第一節 君子，理想的人格範型 [三一七]

(一) 「君子」內涵小考 [三一八]

(二) 溫柔敦厚與質淑端莊：《詩經》中的人物美 [三一九]

(三) 「君子」中國古代理想人格的代名詞	[三二四]
(四) 文化對兩種性格的取舍臧否	[三三〇]
第三節 整飭中節、抑揚頓挫：和諧優美的文學語言形式	[三三一]
(一) 尋找《詩經》聲樂之「和」	[三三二]
(二) 從聲韻、篇章、語詞看《詩經》語言形式之「和」	[三三五]
(三) 永明體和聲律論的誕生	[三四五]
(四) 律詩、曲詞：中國古詩追求形式美的典型	[三四九]
第四節 〈詩〉情〈詩〉境之「和」與中國古代文化的「尚和」精神	[三五四]
(一) 在矛盾關係中尋找平衡：《詩經》情感世界的「中和」之美	[三五四]
(二) 儒道匯合與「天人合一」構想的提出	[三六一]
(三) 尚「和」心理在文學窗口的閃現	[三六七]

引　　言

《詩經》，我們中華民族已經捧讀了幾千年。

「五四」前，漢代始，整個封建時代，《詩經》是被尊為經典誠惶誠恐地讀的，結果著述雖浩如烟海，終離不開解經釋義。

「五四」後，建國後，《詩經》逐漸被作為詩來讀，作為西周春秋那個特定時代的文學來讀，於是，人們從中獲得了十分豐富的歷史生活知識，也在那裏面經歷了一次又一次藝術的漫游，得到了不盡的美的享受。

只是，現在我們又越來越感到，《詩經》似乎不只是屬於文學的領域，也不只是屬於它那個時代的它自身。隨着近年來學術研究領域視野的不斷開拓，隨着文化的話題在各個研究領域的輻射，《詩經》研究的思路也在向着這個方向展開：《詩經》作為我國最早的詩集，又曾經被目為經典，使其研

讀範圍遠遠超出其他任何一部文學典籍，它與中國文化的瓜葛還會少嗎？

于是，對這部被捧讀了幾千年的詩集，我們又有了新的話題，這便是「《詩經》與中國文化」。廣義的文化，伴隨着人類的出現與生俱來，并將沿着人類文明發展的足跡，由低級走向高級，這是世界各民族文化演化的主導方向和共同規律。然而，由于人種、生存環境、文明發展道路等諸多具體因素的差异，不同民族又會形成各自獨特的文化實體，這也是世界文化史已經司空見慣的事實。『中國文化』，不言而喻，是相對於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一個概念，而且，更多的是相對於西方文化而提出的範疇。這幾年隨着比較文化學的興起，隨着文化大討論的展開，學術界已基本認可，較之西方文化，中國文化無論就其思維模式、價值取向、社會心理還是具體的文學藝術，都有自己鮮明的特色，而且這種特色遠不是枝節的差异，而是截然相對的另一種體系。

中國文化為什麼會以如此獨特的姿態巍然矗立于東方之林？那決定中國文化走上特殊發展道路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任何文化，總包含着已經形成的傳統和現時性變革內容這樣雙重因素，而現時性變革的方式、特征乃至趨向，又總會受到傳統或明或暗的影響和制約。因此，就象枝葉果實的基因早就包含在作爲胚胎的種子里面，任何民族獨特的文化風尚，也會在（也只有在）它最初的形態中找到答案。

《詩經》，對於我們中華民族這棵文化大樹，便是這樣一種根基的形態。它是我国第一部詩歌總集，所收詩篇始于西周初年，終於春秋中葉，歷時五百余載，正是周王朝自興邦立業經日升中天直至

「式微」的整個歷史時期。當然，周王朝并不是我國最早的历史朝代，然而，卻可以說是我們中國文化走向特殊發展道路的真正起點，《詩經》正是凝結着那個文化胚胎孕育生長初期各種文化內容的精神結晶。剖析《詩經》之為《詩經》所賴以產生的文化土壤，進而探討在特定文化土壤中長成的獨特的《詩經》對後代文化的影響所在，對於我們從根本上了解中國文化的特征及其根源，無疑是一個有價值的課題。

中國文化與《詩經》，《詩經》與中國文化，這便是本書將要展開的有某種邏輯遞進層次的兩條思路。

目標是輝煌的，它吸引了無數探險者去上下求索，然而，真正的意義往往不在于是否最終達到了那個目標，而就在這探索追求的旅途中。

我只希望能在這條探索真理的旅途中增添幾個堅實的腳印。

第一章 牧野之戰：中國文化的轉折與起點

——孕育『詩三百』的文化土壤

中國最初的文化形態見于何時？

撇開摻有太多后世觀念成分的傳說時代不論，殷商應該說是我國最初的信史時代了。那麼，具有鮮明特色的中國文化是否就是在殷商文化中孕育出來的呢？

根據我們的考察，回答基本上可以說是否定的。就殷商的文化發展而言，自然已經有了一些華夏民族的特征，但總體上來說並未越出世界文化發展的一般軌迹。若沿着這個方向走下去，相信與一般模式也不會有根本性的差异。然而，正當殷商在他那輝煌的初始文化上面沾沾自喜、忘乎所以之時，它那在西北邊陲上的一個附屬小邦國卻悄悄地卻又是迅疾地強大起來，并以一場實際上取決于殷人內部倒戈的牧野之戰，一舉奪魁，搖身成了中原的主宰。這個代殷而立的小邦國，就是周。

歷史的必然都是由一個個偶然顯示出來的，偶然自然改變不了大的必然趨勢，但卻可以左右無限豐富的具體形態。正因為有着这么多偶然，才有了我們這多彩多姿的世界。

周人代殷人主中原，在歷史的長河中，似乎是一個偶然事件，可是因為這個偶然，中國文化的發展，卻出現了突發性的轉折，或者說，具有鮮明特色的中國文化，才開始踩下了它走向特殊發展道路的第一個腳印。

殷文化是個什麼樣子？周文化又是何種形態？周文化是不是中國獨特文化傳統的基始胚胎？只有解決了這些問題，我們才能了解作爲周文化結晶的《詩經》之所以爲《詩經》的根源，也才能了解《詩經》與中國文化的根本關係之所在。

第一節 尚在蠻荒中跋涉的殷商文化

公元一八九八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清代國子監祭酒王懿榮在北京的一個藥鋪中發現了帶字的龍骨，據說這些龍骨是被安陽小屯村一帶的農民從地下挖掘出來的。從此，這些龍骨便從藥鋪轉到學者手中，從此，它們便不再是醫治刀傷的神藥，而成為打開殷商歷史真實大門的金鑰匙！

殷墟甲骨鍛刻文字的發現，使曾經屢屢在典籍中被傳說的殷商時代變成了真正的信史時代；也使傳說中的歷史被印證或被更正。盡管它們作爲卜辭記錄，對殷商社會的反映不免東鱗西爪，難貫首尾，但憑借着它們，再參照着實物和后代有關的歷史記載，我們終于可以更多地了解一點有史以來這

第一部社會畫卷了。

那麼，就整體文化發展進程而言，殷商時代是已經進入了文明時代，還是正在向文明時代推進的旅途中艱難跋涉？

本來，文字的出現本身，似乎已足以說明殷商已經進入了歷史學意義上的文明時代；國家政權的建立，軍隊的使用，王室貴族與一般平民、奴隸主與奴隸不同階層不同階級矛盾的出現等等，也昭示着文明社會第一種社會形態——奴隸制社會的性質。何況傳說中的夏王朝已經開始了家天下，初步建立了階級社會，在夏之後所建立的殷王朝，更理所應當是一個比較成熟的奴隸社會了。

然而，在對史料進行具體考察之後就會發現，其實殷商時代還只是處在從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階段。如上所述，它確實已經出現了文明的曙光；但下面我們將看到，它也確實還帶着非常厚重的氏族社會的遺迹。

傳統與進步，蠻荒與文明、血與火、神與力的交織，構成了這個時代的總體風貌和鮮明特色。

就經濟文化而言，殷商民族似正處于由游牧畜牧向農業種植過渡的時期，身上還帶有游牧民族的一些習性。

從考古和史料可以斷定，殷商顯然早已進入燦爛的青銅時代，《殷文存》所收集的商青銅彝器銘文達七百種以上，可見其青銅器已有相當數量；而地下出土的殷代青銅禮器大多雕刻精巧，也可見其工藝水平已有相當時期的培養。但迄今發現的殷代青銅器具，大多是禮器和日常生活用品，真正用作

農耕工具的并不多見。與此同時，殷墟中反而大批出土了石制農具，如石鏟、石鋤（半月形石鏟）、石鎛等等，尤以石鏟為多，據稱考古學家在河南安陽小屯村發掘中，常常在一個窖穴中就能發現一百把以上。據統計，從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在十處灰坑中，共出土石鏟三千六百四十件^①。這只能說明，殷商時代的農業生產還處于金石并用時代，而尤以使用石器為主，更進一步講，有銅器而不用，顯然農業生產在殷人獲得生活資料的生產中尚未占據十分突出的位置。

說起來，殷人曾經在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內，過着游牧民族的生活。據史書記載，殷人曾「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尚書》序），從成湯建國至于盤庚，仍然是「不常厥邑，五易其都」（《尚書·盤庚》）。這種頻繁的民族大遷移，正說明了他們作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的生活特征。盤庚之后，直到殷紂滅國，「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竹書紀年》），看來他們已經進入了定居的畜牧農業民階段，大概農業生產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有了一定的發展。甲骨文中出現了農、田、疇、井、疆、剗、圃、畯、亩、藝、禾、黍、麥、粟、米、稻、桑、麻、絲、帛等等標示農業的文字^②；卜辭中屢屢出現的「卜受黍年」的記錄，諸如「庚申卜貞我受黍年三日」^③，以及殷王室帝王有關「觀黍」「省田」的記錄等等，都可見殷人確實已經進入了農業種植時代。然而，這時的農業遠未到達十分發達的階段，畜牧業在經濟生活中則正處于最繁盛的時期。

祭祀大量用牲就是一證。從卜辭中可以看到，殷人祭祀似乎毫不吝惜牛羊，一次幾頭、幾十頭，甚至可達幾百頭。如《合集》三萬二千六百七十四片：「丁」卜，又燎于父丁百犬百牢，卯百牛^④，